

从杭州到建德

《四库全书》成书于清乾隆年间,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,共缮写七部分置于文渊阁、文源阁、文津阁、文溯阁、文宗阁、文汇阁和文澜阁,此七阁也称为“北四阁”和“南三阁”。《四库全书》成书二百余年,历经战乱浩劫,其中三部毁于战火,七阁藏书仅存四阁,其中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存于江南名城杭州。

1937年8月,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,杭州危在旦夕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及浙图的大量图书亟待抢运。其实早在“七七事变”爆发不久,陈训慈即开始准备搬迁,他命总务组赶制木箱,以备不时之需。8月1日,浙图职员将搬迁图书装箱,其中阁书140箱、善本88箱,8月4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暂存,陈训慈委派图书馆职员毛春翔全程押送。此时的杭州已风声鹤唳,敌军飞机不时来袭,陈训慈在9月13日日记中如此记载:“忽警报声作,继有机声越上空过。自九时至十时半始解除。”同一天,他还记述了《四库全书》的运输情况:“善本及《四库全书》已迁富阳,由毛春翔君管理。今得一信,报告近状,谓地处群山围绕之中,旧屋不显,可望不致遭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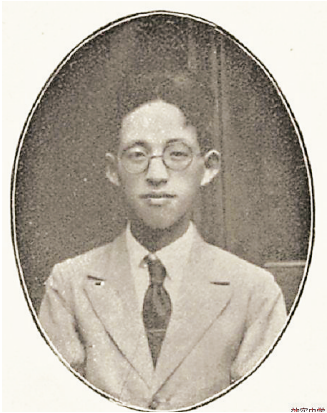
杭州与富阳仅一江之隔,日机轰炸杭城日益激烈,富阳可闻爆炸声,一旦杭州失守,日军旦夕渡江,随时可达富阳,阁书必须再次搬迁。1937年11月底,阁书及馆藏善本共计230余箱由富阳装大船转运,但因水势被阻滞桐庐不能行。陈训慈找浙大校长竺可桢请求帮助,竺可桢同意帮忙,“《四库全书》与善本前自富阳抵桐庐,觅船不得,赖浙大卡车之助,分运三天已全抵(建德)绪塘。”

绪塘位于建德西乡,大多为方姓,乡长方锦崇为当地富绅,经其介绍,图书暂存其族叔方立斋家中。但陈训慈认为存书处距离公路太近,不甚安全,于是便与方乡长一起去山乡另觅地方,但一时也没找到合适的所在。陈训慈对绪塘印象很好,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个还未被日寇炮火蹂躏的美丽所在,虽寥寥数语,却是形神兼备:“山中风景甚美。山中人甚勤朴,田本瘠而农竹甚普及,山中作物生产尤多。”

当时抢运这些珍贵书籍最需要的还是资金,杭州沦陷前,陈训慈拜访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遇冷。许绍棣告诉陈训慈,杭州仅三四天可守,自己忙得很,对于图书馆抢运书籍一事“无何具体意见”,态度非常消极,后来陈训慈又多次请示,许绍棣态度依旧。陈训慈在日记中记道:“教育厅所存节馀数万金(其中图书馆本年度临经费四千元)皆扣不发,今急用搬迁书避难之际,何以墨守官家之不肯负责之办法,置重要图书设备之安全不理,真令人感愤极也。”后

文史大家陈训慈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胞弟,1932年至1941年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,期间还曾兼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和浙大龙泉分校主任。抗战爆发后,陈训慈将馆藏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及其他善本转移到浙江偏僻山区,后又辗转运到重庆。据日本学者记述,杭州沦陷不久,日本“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”曾于1938年2月派人寻找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,但因该书刚被陈训慈转移而未得逞,假若当时不及时搬迁,国宝必落敌手无疑。

陈训慈文人出身,有记日记的习惯,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运书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和困难,描述了不同人物对抢运《四库全书》的态度及看法,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浙东山区的风俗面貌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日记并未完全保留下来,但还是为我们留下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抗战史料。



陈训慈

陈训慈的『运书日记』  
——  
一个文人的抗战史——

文本刊特约撰稿

王凯



《四库全书》

来教育厅耐不住陈训慈的软磨硬泡,允许借发300元作为经费,但这区区数百元根本办不了什么事,无奈之下陈训慈只好四处借贷。

陈训慈12月10日日记记述:“又为运书款绌,已向张晓峰借二百金,自垫二百金,今悉罄。无以应挑工工资,乃往访振公,仅借得六十金,应付颇不易。”陈训慈无奈之下,再次向省教育厅求帮:“为搬迁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,各方借款甚多,而书在途中,挑运仍须费用,经常费用无力垫还。因念如此文物,教育厅不视为本身事,至赴杭借资,而今已自筹借债运出,然在杭书尚多,宜可续运,……请特拨运书费八百元。”

沉重的压力几乎将陈训慈压垮,他感叹说:“无车无钱之苦,至此乃饱尝风味矣。”

四处奔波

1937年12月24日,杭州陷入日本人之手,浙江省政府迁到浙中小城永康,省府各厅迁永康城东的方岩办公。

在这种形势下,图书放在建德显然已经非常危险,在浙江境内也不安全,陈训慈为此四处奔走,呼吁当局尽快将这批珍贵图书运到西南大后方。1938年1月7日,陈训慈写道:“到永康后第五日。……最所不安者为文澜《四库全书》。几经面陈教厅当局,以迁往内省为宜,而迄不得要领(每谓内地亦不安全,岂不知相对的安全,自有差殊)。今既无馀钱又无交通工具,无米之炊,前已饱受痛苦,今将安所效力。瞻念万一疏失,将何以对浙人,何以对文化,不禁殷忧,尤不禁对主持教育行政者致其愤愤也。”

1938年元旦前后,陈训慈为搬运图书事奔走于永康、方岩、金华等地,虽然诸事缠身,忙得焦头烂额,但还是忙里偷闲,在日记中记录了沿途风光和许多趣事。他在1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:“今日舟行约五十里而弱,晚停泊范村。沿途江流夹山,水深滩多,往往石岩耸起,水流湍急,山峦重叠,若至绝境,而转眼之间,水流又平,山暗树明。”看到如此美景,陈训慈不禁感慨万千,数年来在杭州条件便利不知抽空旅行,直到今日躲避战乱方知欣赏浙江之佳山水。午后舟中沉闷,陈训慈和同事弃船登岸,帮助船夫拉纤。此间陈训慈还童心大发,拔当地农人畦中萝卜数枚食之,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:“是亦突来之窃行也,戒戒。”

当时的浙江省府主席为桂系巨头黄绍竑,他对搬运阁书一事不甚热心。教育部曾发电给浙江省府,请浙江方面“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,望贵省府设法运黔”,陈训慈在日记中详记了黄绍竑的态度:“余始闻之某秘书,见李先生竟未及此,不禁问教部有何电云,李君即出电相视,并谓‘此电甚空洞,主席见之甚不高兴,谓土地人民如放弃,文物何足云。入贵州岂谓黔省以东之大地悉准备放弃也?教部有办法,惟自来运’云云。已电告‘正迁浙南,不便远迁’也。”

陈训慈数次呈请迁阁书于内地而未果,战火渐近,《四库全书》命运堪忧。

阁书西运

对于《四库全书》的搬运事宜,教育部的意见是迁往内地贵阳,而浙江省政府不愿将书运出省外,欲迁往丽水。

抢运《四库全书》当时面临两大难题,一是经费问题,二是交通问题。经过陈训慈的四处奔走筹措,经费问题基本解决,还需解决交通工具问题。战时交通工具极度匮乏,而浙江省立图书馆并无卡车,所以在运书事宜上,陈训慈多次往访竺可桢校长寻求帮助,每次求助,竺可桢都慨然相帮。对于竺可桢的帮助,陈训慈感激异常:“当库书尚未西迁时,这批笨重的线装书(包括方志及善

本)初运至浙江富阳,需迅速转运浙南,但当时船只极少,浙图又无自己的卡车,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,幸赖竺师对浙图之同情,对文物图书之重视,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,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。”在竺可桢等人帮助下,陈训慈历尽周折,将图书运到金华,再转运龙泉。1938年1月底,阁书终于运抵龙泉,暂存县城之中心学校。

龙泉旧属衢州地区,当时衢州有军用机场,属于抗击日寇的战略要地,当然也是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,所以阁书在此很不安全。这时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来浙,商量将阁书运往贵阳,理由是西南僻远,战事不至波及,存放那里可高枕无忧。对于此事,陈训慈这样记述:“五时接一吉安来电报,电云:‘教部已三电浙省府速将《四库全书》运往安全地点,并指令浙大协同办理,即派李絜非兄来,请兄赴藏书地方会商。’”对于教育部的意见,浙江省政府开始并不情愿,但后来战局不利,只好同意,这批珍贵图书至此才得以运往贵阳保存。

1940年秋,陈训慈应其兄长陈布雷之邀,远赴重庆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任职。上任途中陈训慈专程去贵阳地母洞查看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保管情况,恰好当时负责看管图书的保管员夏定域去湄潭浙大任教,《四库全书》无人看管,陈训慈遂将与自己同行的表弟柳逸厂留在贵阳,接替夏定域的工作。后柳逸厂因病辞职,陈训慈马上函召原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赶往贵阳接管阁书,并寄旅费300元。1941年2月,陈训慈正式辞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一职,虽然离开了浙图,但他依旧关注《四库全书》的动态。1944年11月,日寇长驱入黔,阁书危在旦夕,陈训慈晋谒教育部部长朱家骅,商讨阁书搬迁。经过陈训慈的争取,教育部派卡车六辆赴贵阳搬运图书,1944年年底,阁书全部运抵重庆青木关,藏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瓦房中。

陈训慈以一介文人之躯,历尽艰难,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的种子,他的这部《运书日记》其实就是一个文人的抗战史。📖



晚年陈训慈在书斋内



《运书日记》